

前哨

QIANSHAO

列宁格勒印刷工厂工人理论小组

二〇二二年二月

1

前哨

月刊

列宁格勒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 编辑出版

二〇二二年 第一期

目 录

声明	3
菲共：SIM 卡登记是以打击犯罪为幌子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侵犯.....	1
◎原著选读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节选）	3
致敌人.....	7
◎社论.....	8
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当前文艺的心脏	8
皇帝就是最大的贪官，“资本家的国家”就是“理想的总资本家”	10
中修和苏修有什么区别？	13
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15
◎转载.....	17
对近期“生育八孩女子”一事的简要分析	17
孔夫子在莫斯科.....	19
也谈“历史周期律”	23

声明

欢迎各位读者向以下两个电子邮箱：leningrad3rdprinting@protonmail.com;
leningrad3rdprinting@tutanota.com 投稿自创文章或者提出意见。使用 Protonmail 和 TutaNota 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为保证您自己的安全，请不要使用国内的写作软件或者电子邮箱服务进行投稿。请从 <https://lenin3print.github.io/> 获取最新和以往每期《前哨》月刊。每期发刊时，页面上将会增加新一期的下载链接。

毛主席语录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斯大林语录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杀那个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學智可與列之主義

菲共：SIM 卡登记是以打击犯罪为幌子对隐私 权和言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侵犯

菲律宾共产党首席信息官 马尔科·瓦尔布埃纳

菲律宾共产党（CPP）谴责以打击网络黑子和犯罪活动为幌子草率通过直接侵犯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 SIM 卡登记法的作法。这项将由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签署的拟议法案将要求一切形式的公共电信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现有用户和新用户使用他们的身份证登记他们的真实姓名。

拟议的法律还要求电信公司将用户的数据和信息从其移动服务或社交媒体账户停用之时起储存 10 年之久。

这项法案是对隐私权的公然侵犯。它将使隐私已经在大公司和政府收集个人和元数据的过程中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恶化。我们都知道被称为大数据的大量信息是如何被大公司和政府收集和滥用来对付普通人的。

SIM 卡登记将高效地限制人们的匿名权。匿名是人民言论自由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确保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甚至新闻自由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匿名性。匿名是对抗暴政和偏执的盾牌。

通过 SIM 卡登记以及可以从手机、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连接设备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反动国家和大公司将可以合法地访问任何个人的私生活，揭露他的通信和行动，以及政治、职业、宗教、家庭和性关系。在暴君统治下，要求登记 SIM 卡更将使反动国家拥有超出合理的政府利益的多余能力来监视普通人和记者。

剥夺所有可能的匿名形式会使恐惧的阴云永远盘旋在人民头上，使他们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参与公共辩论。SIM 卡登记法案肯定会阻止那些害怕被滥用权力的军警、大官僚、政府官员和大公司以及宗教当局报复的人们表达他们合理的不满。

SIM 卡登记法案肯定会导致恐惧和沉默的文化。对政府腐败、军警暴行、侵犯人权、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企业肆意妄为、环境破坏以及其他强大实体的不当行为和犯罪的举报将会减少。这是因为人们，包括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在举报任何渎职行为之前，总是会三思而后行，他们知道这些信息可以追溯回他们身上、他们可能会受到报复。

因此，SIM 卡登记法是一项法西斯法案，它会进一步缩小民主空间。在红色标签、恐怖主义标签、“反恐怖主义法”和从事武装恐吓、诬告、监禁、绑架、酷刑、谋杀批评者及爱国民主力量的国家军队中盛行的对犯罪熟视无睹的文化的面前，SIM 卡登记法将成为针对人民的又一个国家恐怖主义威胁。

打击犯罪和黑子的借口是毫无根据的。它不要求在网络金融、法律或商业交易中引入安全的方法，而是把诉诸对隐私权的全面践踏当成阻止欺诈和犯罪的所谓解决方案。不去提高执法者网络取证确定罪犯的能力，却来要求所有人都要接受电子搜查，并放弃他们的隐私权和匿名权。

SIM 卡登记不仅不能遏制犯罪，反而会加剧犯罪，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有组织犯罪和国家力量都拥有大量的资源，他们可以通过 SIM 卡复制、在漫游模式下使用外国 SIM 卡或使用卫星电话来轻松规避 SIM 卡登记。要求 SIM 卡登记也催生了非法 SIM 卡的黑市和身份盗用。

2009 年，墨西哥要求对 SIM 卡进行登记，但在三年后因发现它在预防、调查和起诉犯罪方面没有效果而将其废除。而在巴基斯坦，SIM 卡登记导致出现了未登记 SIM 卡的黑市和身份欺诈。

菲律宾人民必须反对 SIM 卡登记。他们必须捍卫自己的隐私权和匿名权，抵制所有在国家恐怖主义制度下侵犯其民主权利的政策和措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节选）

毛泽东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

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

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

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

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致敌人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难道你们不能把真话
注入心田，
让真话不受恶意摧残，
自由发展？
我看你们歪曲思想，
确实内行；
你们可以善恶不分，
但要以恶为善却是妄想！

你们常常咒骂别人，
决无好处，
获得荣誉靠的是劳动，
而非对别人的凌辱！
你们想飞黄腾达？
那就请拿出意志、力量和智慧，
步人后尘却又蔑视人，
不会捞到半点油水！

说吧，不论你们设下多少圈套，
《信使报》岂会迷航改道？
还是让它走自己的路，
把消息传递到各处！
真理永远是真理，
真理比谎言更有力，
俗话说得好：
“真话自能服人！”

写于 1839 年 2 月 24 日左右

载于 1839 年 2 月 24 日
《不来梅市信使报》第 4 号

署名：泰奥多尔·希
原文是德文

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当前文艺的心脏

——解剖 2022 年春晚的一次尝试（一）

无产者

编者按：自华国锋—邓小平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文化、艺术和糜烂的生活方式移植过来，毒害中国人民。工农兵的文艺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文艺，世界上一切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为落后、反动、腐朽的东西，都在中国这里找到了适宜繁殖的土壤。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开展文艺批评。打倒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艺，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他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逻辑出发，捏造出自己所臆想的“空前盛世”，以掩饰本阶级背地的剥削和压迫，以愚弄这受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便是春晚的内涵。

在现今中国的一年里，资产阶级要逼迫劳工们做牛做马，掠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年末，他们又对无产阶级施加莫须有的宽慰与关怀，一面用弄虚作假的《劳动法》作指示，允许他们返乡过年，与家人团聚，一面利用几倍工资威逼利诱，推行就地过年，不停工的政策.....

这些罪行在一台台情景戏中被掩埋了，那些政策在一场场歌舞剧中被美化了，成为神圣而美好的谎话，然而，此类怪诞也在群众的眼中愈发显露，受到批判，这是好的现象。起初春晚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科技进步（电视在 70 年代开始向大众中的普及），是值得令人欣赏的，也的确营造了家庭团聚的喜悦氛围，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只会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从 70 年代末，无产阶

级专政的意识形态由盛转衰，到九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工农兵文艺一去不复返，文艺服务的对象在于官僚，资本家，以及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将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灌输到春晚里，以丰富的艺术形式伪装，好要被“老爷们”夸耀几番，好让人民群众多受几次骗，上几次当，闲余功夫还可以打打广告，蹭蹭收视率，为黄四郎们多刮些油脂。而近些年来，娱乐界中的消费主义逐步加深，演员的偶像化浪潮席卷而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加深自然也就加剧了春晚的腐化，将更根本的问题暴露无遗（文艺为谁服务？），极端的脱离群众，还要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群众，群众自然要批判。

人民群众近年来说春晚“不好看”，实际就上是在批判春晚的政治内涵，可观的是，它在往年的播出中每一次都腐朽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知乎上有人开玩笑说：“202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届，但仍然会是此后十年最好的一届。”

而矛盾的是，在春晚的艺术形式上，一些节目总能突破往届的高度，结合科技（特别是AR）带给人强烈的视觉效果，群众对这些也赞叹不已，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愈来愈脱离实际，天马行空，图一时新鲜，看久了实在差强人意。毛主席说：“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春晚上的某些亮点，并非是为无产阶级而服务的，却受到了群众的欢心，这些节目艺术性科技感很强，但政治意义却隐藏的更深，更加反动，容易带给人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艺术性的狂热崇拜，只顾形式从而忽视了它的内容，在批评春晚的时候只对比了节目之间的艺术性，忽略了政治，批判也就走上歪路，反之亦如此，这都是斗争的不彻底的表现，从好的方面说也是教育自我识破敌人障眼法的关键。只有将文艺和政治统一起来，用先进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批判地改造现实，才能让敌人的武器为己所用，从而丰富自己的艺术形式，同时紧紧依靠群众，最终让文艺大军对准敌人的心脏——资本主义，朝它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下一期我将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佐证这些结论。

皇帝就是最大的贪官，“资本家的国家”就是 “理想的总资本家”

葛兰东·蒲鲁西

现在许多人都反对“资本家”，但他们说什么要给腾讯“收归国有”，又有的听说政府“反垄断”，给阿里巴巴开了巨额罚单，直呼“资本家”的末日要来了。

这种所谓反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正是把国家所有制给当成了“社会主义”。如果就形式而不是就内容来说，“国家所有制”甚至不是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产物。早在中国的北魏至唐朝前期，就有实行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均田制，官府将国有的土地按人口分给小农耕作，到期收回。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开始日益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列宁对此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越是继续发展，资本就越来越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越来越趋向于合并、统一领导。这种趋势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作为“凌驾”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资本主义机构——国家，终究是不得不承担对生产的领导。恩格斯指出：“……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量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

但是，自从这种国有制一出现，就有人开始鼓吹说这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甚至更进一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了。它虽然是国有制，但国还是资本家的国，这个国家只不过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国有制还是一种资产阶级私有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这种论调进行了驳斥：“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

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的又一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不是被消灭，而是得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被推向了顶点。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了空前的腐朽，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和社会主义如此接近，近得和相邻的两级台阶一样，那么不难想象：社会主义社会一经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倒退一级台阶，蜕变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看——上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曾明确提到：“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如果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搞什么‘利润挂帅’，那就在根本上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发展下去，就将使生产资料最终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不顾人民利益、单纯追求利润的工具了。”

如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以利润为纲。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深刻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一旦为了赚钱而生产，就是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来支配生产，社会主义就即刻变成资本主义了。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苏修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嚣“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提出要把“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建设单位的重要指标。苏联走资派的资本主义复辟梦想就是从这里变成现实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是先从利润挂帅做

起的。197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就鼓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企业实行经济核算，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诬蔑为‘利润挂帅’。散布什么‘只要路线正确，亏损也不要紧’等谬论，形成‘亏损有理，盈利有罪’，搞得谁也不敢抓财务、讲核算。”

“英明领袖”在污蔑给四人“帮”的同时大肆宣扬他从苏修学来的先进经验——利润挂帅。按照华主席的说法，四人帮是成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尤其王洪文，说是有“花几百万盖的别墅”，在整天“吃饭、喝酒、看黄色影片”的同时“精心策划篡党叛国的战略部署”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种人居然还讲“亏损也不要紧”，真是奇怪。资本家还知道爱财如命，知道追求利润，这么一对比，四人“帮”搞起资本主义来，好像还不如华主席“英明”。

在“英明”领袖的“英明”领导之下，“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变成了“利润挂帅”，“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被批成“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一长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等等全都死灰复燃，社会生产的目的从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变成了利润即资本的增值，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正式在中国复活。

中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国家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又公开声明要为私营企业家（读作：私人资本家）保驾护航，部分地方官僚甚至称私人资本家为“衣食父母”。大量官僚“下海经商”，又有大量私人资本家进入“体制内”。2003年，就有43%的私人资本家是中共党员。2013年全国人大，私人资本家的代表占23%。“民营企业”也不断成立“基层党组织”，截止2018年，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已达到48.31%。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中小私人资本日益紧密相融，推行他们的联合专政，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为他们的总政治代表。

无论后续经历如何“改革”，中国“共产”党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总政治代表对于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都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是扩大了垄断的规模，使中国“共产”党一跃而成为了全世界最大号的垄断集团。

《水浒》花费大量笔墨，让人知道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要成为投降派，因为皇帝就是最大的贪官。而“只反资本家不反资本家的国家”就要成

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保皇派”，因为“资本家的国家”，就是“理想的总资本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中修和苏修有什么区别？

葛兰东·蒲鲁西

有一些人，他们总是说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始于“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并据此声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他们还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要从 1991 年苏修垮台算起，甚至鼓吹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的混合体”。这种从邓小平口中抛出的“市场经济”的奇谈怪论，居然在今天得到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认同，实在令人唏嘘。中苏论战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留下的珍贵文献资料，正是反驳这种修正主义谬论的有力根据。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指出：苏修在农业领域推行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不仅改变了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性质，而且也使农村私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如今，苏联私有经济在国家商品流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九七二年苏联报刊供认，个人副业提供的商品，占全部商品农产品的百分之十三（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据西方估计，约占四分之一左右），有些农牧产品私有经济提供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上。在今日的苏联农村，投机倒把猖獗，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和地下农场主、牧场主不断滋生出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到处泛滥，实际上已经合法化。而勃列日涅夫集团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指出：据报道，到一九七三年初，苏联已建立了五千多农庄、农场合办企业、联合公司和联合组织。即使这样，也没能帮助苏修摆脱农业的困境。同时，苏修的农业政策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自由经营的迅速膨胀，自留地面积扩大，个人副业发展。据西方估计，苏联目前私人经营农业的生产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指出：由于苏修取消了对自由市场的一切限制，使苏联农村的私人“副业”大肆泛滥，城乡自由市场空前“繁荣”。

苏修报刊上偶尔也刊登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假惺惺地表示苏修当局是在反对和制止这些现象。其实，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地下工厂主、农场主、牧场主等新资产阶级分子正是苏修当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勃列日涅夫集团既是苏联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一切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指出：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指出：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在内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它的国民经济中重新发生作用。尽管他们继续制订计划，规定发展比例，但结果是，计划落空，比例失调，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综上所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当道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实行的“计划”完全是空头支票，他们一方面推进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另一方面则由于让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取得支配地位而不得不依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在生产。事实就是：早在邓小平之前，苏修叛徒集团就早已做出了示范。诚然，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企业、垄断组织、垄断集团的内部存在计划性。垄断的规模越大，这种局部的计划性也就越高，像苏修这样“包罗万象”的垄断集团，看起来确实像是有“全面的计划”。但由于它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不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局部的计划性变为全面的计划性。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补充，私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必然泛滥成灾。

苏修的“集体农庄”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农业，而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邓小平的“包产到户”和苏修“集体农庄”的区别也无非是在于，一个是小生产，另一个是大生产。而中修也早就开始走上通往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道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一大批”专业户，1983提到农村短工和季节工，1986“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再到后来胡锦涛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均使中国农业向着土地兼并、机械化、雇佣劳动化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成为无产阶级，而留下来的农民则大批大批地成为农业工人，也是成为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直至今日，习近平以“扶贫”的名义，加速推进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建立现代化农业，为资本投资找到了新场所。同时，这也使得中修社会帝国主义逐步失去一直以来最庞大的失业工人的“安置

地”，为后续更深刻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苏联解体”也并不是什么“私有化”和恢复“市场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早在之前就已经风生水起。“苏联解体”只是苏修官僚垄断集团经过危机重创之后的破产清算，是苏修官僚垄断集团的垮台，同时也就是俄罗斯寡头的兴起。垄断资产阶级还是垄断资产阶级，换了一家来统治俄国人民而已。

如果说中修叛徒集团为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开辟了什么叫“新境界”，那就是——后起的私人垄断资本，这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的苏修所不曾见过的。然而牢牢掌握中国的土地、金融、能源、电信等经济命脉的中修叛徒集团并没有打算让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私人垄断资本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大搞资本兼并，大力发展联合公司。意图把私人垄断资本“收编入党”，挂上“赵家”的招牌，以此扩大垄断规模和资本输出规模，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罪恶统治和帝国主义争霸服务。

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主义兵

这个所谓“时代”，并不是指什么“电子时代”、“全球化时代”，又或是中修叛徒集团号称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列毛主义所讲的时代是有它严格的科学内容的。

列宁指出：“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打着别人的旗帜》）

上个世纪，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划分时代的科学原则，在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之后，做出了“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英明论断。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是没落的、垂死的阶级，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而无产阶级则“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作用。

列宁逝世已经一个世纪，毛主席逝世也将近五十年，世界经历了二战和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的崭新局面，在这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了失败和低潮，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霸主。而今天，又出现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帝国主义争霸再一次愈演愈烈，也就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将要东山再起。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时代没有变，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规定的，只要这些矛盾没有解决，事物的本质就不会变化。在列宁、毛主席逝世之后，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最基本的特征——垄断，不仅没有消除，还有了更大的发展。全球资本输出量迅速扩大，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争斗愈演愈烈。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仍然完全适用，马列毛主义仍然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仍然是指引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旗帜。

在列宁、毛主席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矛盾，在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尖锐，愈发扩大。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且是帝国主义空前腐朽、走向死亡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胜利的时代！

对近期“生育八孩女子”一事的简要分析

乌衣巷

编者按：题目是编者加的。文章比较简短，揭露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妇女的遭到残酷迫害的现状。

这件事疑点很多，但我觉得最大的疑点就是官方造假。我们用官方的话去假设。

首先“小花梅”从小生活在云南一个极度贫困的小村庄，人口数量现在才 45 人（试问那些情况是找什么人怎么调查来的？怎么能时隔二十几年还记得那么清楚？），2006 年全村年总经济 16.68 万，当时（80-90 年代）的教育水平一定非常低下，她是怎么说出“世界不要我了”、“那一窝，通通都是强奸犯”这些话的，这些不可能是董某教的吧！

第二，她是怎么在 1994 年跨越 213 公里去保山市相亲的，1990 年云南有了第一条高等级公路（石林至安宁），到 1996 年才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昆明至嵩明），两年以后又离了婚，回到老家，行为异常，这两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导致这些情况？这样看，也许就是被村里人拐卖过一次，最后又被拐了第二次。

第三，突然蹦出来一个桑某，说她受花梅的母亲的嘱托带她去江苏看病，但请问江苏在什么地方？离他们 3052 公里！为什么要看个病舍近求远，斜挎整个中国，而且文中提到了“小花梅亲属反映……”说明她的亲属还在，那么她的母亲为什么不委托她的亲属带女儿去看病，让一个外人去。

第四，桑某去江苏的目的是什么？在丢失花梅后为什么不报警？究竟是“主动遗失”还是“被动遗失”，找个“好人家”嫁了，我看这个董氏就是那个“好人家”吧！

精神分裂是精神疾病中最严重的病症之一，女性发病年龄高峰 25~35，所以可以预估一下花梅的年龄（当然极不准确），但是这个病是多发于青年和壮年时期的，也只有在这个时期遭受非常大的精神创伤（比如被拐卖）才会得。

顺便一提：欢口镇董集村，曾经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到最后公社解体，一切返回到腐朽的封建世俗，“八孩母”事件其实也就水落石出了，就是旧社会的那一套死灰复燃了！董氏家族这个这个地主阶级余孽在旧文化方面很有修养，“拐卖妇女”“男尊女卑”倒也是入乡随俗了。

附：官方通报

1月28日以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针对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和网友关切，徐州市委市政府及丰县县委县政府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组织力量走访基层派出所、镇村干部群众，调阅档案资料，咨询相关法律专家。目前，杨某侠的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有关部门对八个孩子与董某民、杨某侠的关系作出了鉴定。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对此事中涉嫌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关于杨某侠身份问题，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当即派员赴云南进行核查。调查人员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并扩大至周边多个乡镇开展调查走访，同时发布协查通告。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谷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据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据小花梅亲属反映，同村的桑某某（女，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目前，丰县警方已找到桑某某了解情况，桑某某称，当年她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后续调查情况将适时公布。

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杨某侠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目前杨的精神状况趋于稳定。入院检查结果表明：杨某侠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其他健康指标正常。

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有关情况将适时公布。后期将根据对董某民的调查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将从此次事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工作机制，落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困难群体的帮扶保障。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2022年2月7日

孔夫子在莫斯科

康立 《红旗》1974年1期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人民置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历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历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剧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担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者的尊孔一模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

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悼，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惶交加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子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子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则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

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子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几，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一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

在“钟鼓馔玉，礼乐倏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觑着脸说：首先“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一个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口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揭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门，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用孔夫子这块砖头来敲中国的大门，作为这出闹剧的目击者，我们不妨提一点意见：你们的老祖宗老沙皇横敲竖敲都碰了壁，难道你们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会有更好的下场？

也谈“历史周期律”

姚春雷 1976.8

1945年的窑洞对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那么黄炎培的周期律就是指：政权自身由“积极”走向“堕落”的过程，跳出周期律也就是说，避免政权由于自身的堕落而走向灭亡。

黄炎培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也就是说，所有政权都是因为自身的“堕落”走向灭亡。事实果真如此吗？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占有土地，在政治上掌握国家政权，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强，迫使农民大批破产。封建剥削制度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农民为了摆脱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前赴后继，对封建制度开展了英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而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竭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所以，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斗争的中心内容则是土地。历史上，每个新朝代开始土

地资源都相对充足，随着土地兼并，“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的反抗也相应由抗租抗税斗争发展到农民起义，农民在起义的过程中消灭反动军队、捕杀封建官吏、镇压土豪劣绅，砸烂封建国家机器，同时农民得到土地，工奴获得人身自由，打击封建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封建社会历次农民战争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都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由此进入所谓的兴亡周期循环。但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只是相对缓慢，是螺旋形的上升，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循环，否则，怎么能够解释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呢？

可见，历史上的政权并不是因为“堕落”而灭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政权或统治集团自身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政权自身的因素中，起决定性的是这个政权是否执行正确的、符合先进生产力要求的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政权是否是先进阶级，是否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地主阶级是上升的阶级，是真老虎。秦始皇行商君法，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北击匈奴筑长城，巩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自从盐铁会议之后，法家学派不再作为显学，这也昭示了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下坡路。新朝的王莽，不可谓不励精图治，大搞“托古改制”，以改革之名行尊儒反法的复辟之实，点燃了绿林赤眉起义的怒火。“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王莽甫一即位，大刀阔斧改革，至死都坚信自己的事业“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能说他积极不勤奋吗？但是越是勤奋，越是会加快走向灭亡的步伐。

诚然，历史上有些政权的灭亡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譬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自身力量客观上的弱小等，但是归根到底，一个政权如何能够生存，不在于主观上是否勤奋，是否“不忘初心”，而在于它是进步还是落后，是革命还是反动。把政权灭亡的原因归于主观愿望，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能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

黄炎培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自认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却如获至宝，拿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大做文章。认为只要接受监督，并“自主革命”，就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人民的监督，是毛主席对于黄炎培问题的回答。

彼时，在七大的党章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当时的毛主席的眼中，未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政权，与苏区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一样，与几十年前的巴黎公社一样，是与人民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按照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人民民主政权就可以一直兴旺下去。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建国后的实践中，毛主席逐渐认识到，党内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上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不同于革命时期，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了主要矛盾。单靠原来普通的监督和批评教育是无法解决党走向变质反动的问题的。最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夺权，才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权力是不能被代表的，无产阶级只有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证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不受动摇。事实证明，“监督”只有在主要矛盾是外部矛盾，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相对缓和时能够起到维护自身先进性的作用，在正常执政时期是无法长期保证政权的先进性，也就无法保证生存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对毛主席最初所说的“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扬弃，也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黄炎培所说的“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让民主落到了实处。

那么“自主革命”是否可行呢？“自主革命”说穿了就是改良。改良是在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的、个别的社会现状的改善或改造。生产关系的局部的先进部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政权的生存。但是改良不是无条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历史上的改良，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迫于现实的压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这是剥削阶级的本性。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让民意能够影响到决策，但是不要忘了，民主权利本身也是无数流血斗争换来的。“自主革命”真的存在吗？如果不是各地农民风起云涌的斗争，苏修怎会取消农业税？如果没有国企工人的怒吼，苏修怎会放缓国企私有化的步伐？

退一步讲，一个政权如果不断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式而做出相应的改良，它是否能够一直生存下去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如果一种生产关系已经释放了全

部潜力，那么统治集团除了自我毁灭之外，是做不出任何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举措的——它们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由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一旦有一天发生解体，那也决不会是自我毁灭。只会是苏修叛徒集团进行的一次大分赃：最高苏维埃和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们，摇身一变成为未来独立的共和国的国家领袖和大资本家金融寡头，国家仍然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形式变化了而已。社会主义的苏联，早在赫鲁晓夫上台的那一天就不复存在。

从古至今，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能够永不灭亡，永享万年太平吗？没有的。苏修的两大“法宝”，只能是连文本考据学价值都没有的自欺欺人。而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摆脱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的局限性，推翻反动统治集团，自己做国家的主人。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列宁语录

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流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阐明。

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毫不动摇地走向胜利的道路。